

# 天下兴亡 舆论有责

## ——以苏联及东欧剧变为例

岑 清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苏联及东欧剧变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 西方的新闻媒体操控了苏联的社会舆论以达到他们“和平演变”的目的, 同时苏联政府本身政治上错误的决策和对新闻舆论的疏忽在其中又起了极端消极的作用。通过分析这些史实, 提出在中国新闻舆论控制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针对中国新闻媒介舆论的特征和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方法来达到有效合理的舆论控制。

**关键词:** 舆论控制; 第四权力; “硬性”和“软性”; “新帝国主义”; 消费主义; 隐性引导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10)-02-0019-04

## Consensus Control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CEN 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western mass media controlled Soviet consensus to achieve peaceful evolution in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in 1989,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produced by soviet government's false decisions and negligence. Given the analysis above, we propose the necessity to control Chinese public voices and also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conduct effective control over Chinese news media based on current news medi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tatus quo.

**Key words:** consensus control; the fourth power; "hard" and "soft"; "the New Imperialism"; consumerism; recessive media guidance

在 1989 年到 1991 年间, 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被推倒了, 其时间之迅速, 震荡之巨大, 令人震惊, 发人深省。反思其剧变之原因, 无疑是多方面的: 政局的动荡、经济的衰退、文化的混乱、政策的失误、国际形势的波云诡谲等, 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新闻媒体被西方操控而使舆论的掌握失控, 致使民众思想混乱、社会价值观颠覆而最终导致其社会主义国家的毁灭。

在苏联尽管此前曾经有列宁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同时也是伟大的报业家, 有《火星报》、《工人报》、《前进报》这样一系列影响深刻的报纸, 而且

也曾经在革命的进程中起过不可估量的积极鼓动及引导的作用, 但苏联政体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以及苏联后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对报刊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新闻传媒的消极作用埋下了伏笔。

此外, 苏联报业对舆论过于严格的控制和错误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从斯大林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时期开始, 苏联新闻媒介就秉承以斯大林为首的高层领导旨意, 大张旗鼓地刊登点名批判的报道和文章, 对历次重大案件的报道实施统一口径的方法, 成了错误路线的喉舌。二战以后, 苏

收稿日期: 2009-12-22

作者简介: 岑清, 女, 贵州遵义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批判学派、女性主义与传媒。

联报业一改战争年代朝气蓬勃的风格,从内容到版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对外报道上各报刊口径一致,千篇一律为当时苏联奉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摇旗呐喊,并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不让苏联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和世界舆论。其结果是整个新闻媒介舆论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并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西方媒介在以后的剧变中有有机可乘。

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共同促成的,如果说以上两点是导致苏联解体在新闻舆论方面重要的历史原因,那么,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政治路线和西方媒介发展到极至的“和平演变”政策在这次重大变革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开性”原则,反映在传播媒介上就是提出“应当将更多的事实公诸于众”,因为新闻媒介是“实行公开性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在改革初期苏联报业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错误的导向,这种“公开性”渐渐失去了自控和自律,特别是在“历史无空白,批评无禁区”等极端口号的庇护下,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报刊舆论日益混乱而逐渐处于失控状态。在所谓的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诱导和实施过程中,“各个媒体往往互相攀比,追求轰动效应,比谁揭露得多,谁的消息最惊人,谁的用语最尖刻。报刊在刊登议论文章时也越来越危言耸听,越来越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sup>[1]</sup>。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提出的“公开性”、“民主性”和“社会主义多元论”的倡议在主流舆论导向上使报刊进一步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此外,在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意识的影响下各类党派组织纷纷出版自己的刊物,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肆无忌惮地创办自己的报刊、电台,自由地宣传早已变质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主张。在这种混乱不堪的舆论环境中,执政党没有以清醒的头脑对此引起高度重视,更没有在认识清醒的前提下去很好地从正面引导舆论,而是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致使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混乱。民众在思想与情感的惶惑中看不到国家的前途,逐渐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任和信心,执政党也就失去了国家政体的基础——民众,而最终导致苏联这个最早的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坍塌。

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通过媒介的全方位的强力侵入,逐步实施“和平演变”的策略对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著名论断“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的指导思想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

在新闻媒介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法来达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

1. 建立专门面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体系。80年代初的美国之音副台长尼古拉斯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宗教感情的复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通过向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人民反复传播“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等观念,从思想上向这些国家渗透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达到瓦解人心的目的。

2. 在世界范围内以“多元化运动”直接影响舆论。“多元化运动”是指舆论多元、利益多元、政权多元和意识形态多元。它力图通过新闻舆论对苏联及东欧的民主进程施加影响,以各种媒体通过传播消息、通讯、新闻分析、评论综述等对苏联及东欧政权实施干涉,对反政府的“民主派”组织进行扶持、指导和声援。

3. 在苏联和东欧不惜重金和精力培植大批亲西方的新闻工作者。通过资助“民主”新闻传媒、寻找利益代言人、培养反共“民主新闻人士”、资助以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为理论基础的各类“记者协会”、出版西方价值新闻传媒的各种著作等方式,将新闻媒介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吸引大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在此过程中逐渐接受西方的思想体系,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成为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最好的合作伙伴。

4. 协助各国政府的反对派建立各种新闻媒介并给予大力支持。例如,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民主中心”,其任务就是向苏联的“民主分子”提供书籍、印刷设备、电脑、资金等等。1990年戈尔巴乔夫颁布的《新闻出版法》和建立“国际传播电讯”通讯社,又给西方媒介这一策略的实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多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覆灭了。在这前前后后的过程中,它的卫星国——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瓦解,成为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让人扼腕叹息的惨痛历史。今天这些重大的事件虽然已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但我们十分有必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新闻媒介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高度关注。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令全世界瞩目,“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有人叫嚣。作为政府喉舌的新闻媒介对舆论监督和控制的功能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更加任重而道远。

首先,近年来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主题下西方

媒体的入侵似乎不那么明显了,此外,中国受众中相当一部分人本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他们更能自主地依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来选择和理解西方媒介传播的内容,做出相应的正确判断。然而,令我们不得不关注的是,国际文化帝国主义正在以“新帝国主义形式”的更为巧妙和隐蔽的方式试图以潜在的力量影响中国的舆论。

例如美国作为电影、流行音乐、电视节目、杂志、广告的文化产品出口大国,他们往往借助以上形式的媒体宣传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大力倡导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以消费为主的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经济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长此以往,如果没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价值观就会过分强调物质价值,削弱对他人的同情,降低社区精神和公共关系力量,减弱国家面对外来侵害力量时的抵抗力。

消费主义是指消费者最初对商品功能需求的满足发展到对消费数量、种类的商品的服务作为最高追求,且永远无法满足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是由企业为了生存发展通过不断发布的广告来完成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能指是语言的音响形象,而所指是意义或概念,二者一起构成符号。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各种丰富多彩视觉形象的大量出现,能指的含蓄意指已远远超过了直接意指,一个所指可以拥有无限的能指,所以能指就会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估量地“漂移”起来。比如一个简单的吃麦当劳鸡块的行为,可以在无限的能指中演变成一种“健康、时尚、积极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中国随着全球化语境的不断展开,消费主义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一种建立消费者价值的仪式。个人在消费的话语体系下被消解了,人文精神就会变成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这种消费主义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正是无数有识之士在现实中感到忧心忡忡的问题。

此外,美国一直以“人权”、“自由”作为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和新闻媒介的武器。然而考察他们本土的媒体,不难发现,他们所谓的“以事实说话”实际上是通过倾向性地裁剪组接新闻事实来实现的;而他们采访的对象虽然兼顾政府、人民,甚至不乏一些政府的反对者,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往往会以提问的方式打断或注解的方式来左右采访方向,因而其“以事实说话”是有限度的。显然,这样的舆论监督体制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更不能任由其影响和控制中国的舆论。

目前在某些社会层面中消费主义泛滥,公共道

德与责任冷漠,“娱乐至死”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已经不容忽视,因此,根据实际需要控制舆论刻不容缓。从中国媒介自身发展和改革来看,舆论控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控制器,通过对社会舆论的反馈,通过新闻机构内部的过滤、加工和制作形成新闻舆论,起到了促进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性,增加社会运动过程中内部的活动,引导社会向正确的方向运行的重要作用。

舆论控制是统治阶级实施调控的诸多手段中的一种特殊手段,与物质、政策等一起综合作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在市场经济不断趋于完善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舆论环境出现一系列新的特征:一些媒体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对如何调整和发展感到迷茫;公众浮躁的心态使舆论更显情绪化;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导致舆论分散化等等。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因素一部分是上面所提到的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入侵所带来的思想混乱,此外中国媒体目前过于强大的数量和种类一方面造成市场分割,冲击着主流媒体;一方面又形成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和信息污染过大,因而在某些重大和关键的问题上造成舆论的误导;再者以娱乐节目形式为载体的庸俗文化的泛滥也在受众的思想和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针对当前的社会现状,充分有效发挥媒体对舆论的控制作用刻不容缓。在总结其他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加强舆论的控制力的同时,讲求舆论控制的方法和技巧也相当重要。

首先应该由以前的“硬性”转向讲求效益和艺术的“软性”。因为舆论监督终归是一种没有强制力的软监督,只能对各种具有权力性质的“硬监督”起辅助作用,它的威力在于对受众精神上、道义上无形的但却是巨大的影响力。随着受众文化程度和认知判断能力的提高而形成的对媒介的心理期待,一个具有真实性和讲究尊重与艺术的媒体会更加具有说服力和亲和力。

其次,舆论控制应采取隐性引导的方式,使受众从心理和情感上自觉与主流价值观接近。所谓隐性引导首先要符合新闻客观真实的基本规律,还要符合受众的心理需求。“刺激式”<sup>[2]</sup>积累作为双刃剑,既能轻易被西方媒体使用也能为中国媒介服务,因此一定要合理加以利用和控制。对于发展趋势和意义还暂时不清晰的事实,不能隐瞒不报道,而是要以冷静的方法观察、分析,等待能够把握其趋势和方向时再传播给受众,对于一些成分较复杂的事实,应该过滤其可能造成隐性误导的因素,达到有效控制舆论的目的。



再次,一个有效的舆论控制应该把握“动态性”原则,即在动态中加工新闻信息,在输入时也在动态中把握时机和火候;实施控制时也要充分考虑动态的特点。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都是与它的“第四权力”——媒介分不开的。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权力机构对内引导舆论和对外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天下兴亡,舆论有责,在当今处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发展中的中国,以恢弘的气度和开放的心态主动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的同时,应该适度且有效地控制外来舆论,使其积极影响最大化而消极影响最小化。与此同步还应该对党报类的主流媒体的运作机制进行大力改革和探索,以良好的媒体形象努力树立起它们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并引导舆论沿着主流价值观健康发展,促进国家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另外还要合理调整其他媒

体的产业结构,使各种形式的媒介集教育、娱乐、赢利为一体,沿着主流媒体舆论的路线同向发展,为舆论的正确导向起到积极配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3.
- [2]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M].复旦大学出版,2004.129.
-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C].新华出版社,1993.
- [4](美)爱得华·赫尔曼.全球媒体[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 [5]丁柏铨,王雄,董秦.新闻舆论引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6]苏简亚.新闻舆论对社会的引导与新闻控制论[J].苏州大学学报,1998,(03).
- [7]胡钰.美国电视新闻舆论引导技巧[J].清华大学学报,2000,(04).

(责任编辑:王 林)

(上接 14 页)

因此,“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的改革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集聚强大力量。特别要看到,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加自觉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sup>[2]</sup>

总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只有通过科学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只有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才能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从而

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17,15,15,15,16,37.
- [2]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A].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3,57.
- [3]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3-1.
- [4]李琳.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前提[A].“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7.
- [5]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2月)[A].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6.

(责任编辑:魏登云)